

两次鲁迅文学奖、一次老舍文学奖获得者,著名作家阎连科:

## “我是中国作家里被退稿最多的人”

■全媒体记者 周礼雄



■阎连科向观众讲述他的退稿史  
周礼雄/摄

### 阎连科

阎连科,1958年出生  
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  
沟,毕业于河南大学、中  
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,  
中国著名作家,被誉为“荒  
诞现实主义大师”。作品  
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  
文字。代表作有《日光流  
年》《受活》《丁庄梦》  
《风雅颂》《四书》《炸裂志》等。

阎连科的倔强,为他  
带来了退稿的困扰,也  
成就了其两次获得鲁迅  
文学奖、一次获得老舍  
文学奖的荣誉。2014  
年10月,阎连科在捷克  
被授予卡夫卡文学奖,  
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  
位中国作家;2015年  
3月,阎连科凭代表作  
《受活》获得由日本读  
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  
奖,这是亚洲作家首  
次获得该奖项。

近日,著名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在2018南国书香节中山分会场暨第十届中山书展上,讲述了自己丰富的写作生涯和退稿经历。他坦言,在中国作家里面,他一定是被退稿最多的人。

### 写作最重要的是“动真感情”

我1958年出生,1978年开始写作,到1985年这六七年是我的自然退稿阶段。自然退稿是因为写得不好,最重要的原因是,我读的书和别人读的书不一样。二十岁之前,我没有读过一本外国小说,读的都是革命小说,根本不知道外国小说什么样子。

直到20岁入伍,我偶然当了图书馆保管员,才发现有这么多外国小说。我用3天时间看完了第一本外国小说《飘》,才发现这里面的爱情描写、性描写、人物塑造比革命小说好看得多。

基于这样的情况,我写作伴随着退稿,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从1978年

开始,我每年写三五个短篇,基本上都被退了。

1979年,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天麻的故事》,四五千字。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: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,就给指导员送两斤天麻,指导员退了回去,教导他想入党就好好表现,不能用送礼的方式。之后这个士兵因为优异的表现终于入党了。这篇小说能够发表,不仅因为主旋律主题,还因为风光描写比较好。这些风光描写其实是模仿自屠格涅夫的小说。

1985年,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,我虽然

没有参战,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在座的各位无法想象的。1984年,战争还没结束,我写了一部名叫《小村小河》的小说,讲的是一个士兵在当兵之前已经结婚生子,在越南战场上非常想家,害怕打仗。我写的时候痛哭流涕,想家、想妻子、想孩子,想父母,害怕死亡,这是有真情实感的。

《小村小河》虽然经历退稿,但发表后反响很好,这也让我明白,写小说不光要风光描写、主旋律、宏大的主题,最重要的是动真感情。只有作者感动了,才可能让读者感动。明白了这一点,小说发表得就比较顺利了,自然退稿阶段也就过去。

### 在退稿中不断摸索写作经验

1995年,我突然意识到,我每年写五六部中篇小说,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故事,只塑造了一两个人物。我写的全部小说,其实就是一个乡村孩子到军队到城市的个人成长史、奋斗史。如果我写了一百本小说,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,就是因为它的重复。

我希望写作有个调整,不再去写英雄、个人奋斗,而是从英雄回归到人。于是在1994年前后写了《夏日落》,故事很简单,一个农村单纯的孩子到了军队以后,觉得人生没有意义,最后去自杀的过程。写的时候,我感觉写出了又一部不错的

小说。《收获》杂志的编辑说,阎连科,你写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读过的军事文学,但是有一点,确实不适合发表。

军事题材不能写,我就写乡村吧,我对乡村又这么熟悉。那段时间是我相安无事的写作时期,写出了《时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。2003年,《受活》出版,这是一篇没有退稿的小说,也不断得到好评。但我经常说《受活》是非常难看的小说。

写完《受活》之后脑子空空的,又刚转业,没事干,就写了两部小说,还是被退稿了。之后,我觉得一定要调

整写作方向,写出真善美。后来写的小说《风雅颂》,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,写得非常有想象力,但仍然是退稿。当时,《作家》出版社主编约我吃饭,给小说提了几点意见。他说,稍微修改一下就能发表。于是,他拿出一张纸记了十八条,我说第十八条确实没法改。

之后我写了《我与父辈》,再也没有一本书像《我与父辈》一样毫无争议,人见人爱。这样的散文随笔可以写,但不能连续写。我希望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难度的,是写得辛苦的,是要思考的。

### 退稿对作家不是坏事情

这段时间我想了非常多的问题。四五十岁的年纪我常常会去医院看望上一代的作家。他们躺在病床上,都跟你说,唉,阎连科啊,你要努力写作,别像我这样,到了写不动的时候才发现,我最好的最想写的还没写出来。我想我一定不要跟他们一样,七八十岁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感慨一句我最想写的小说还没写出来。我还是想在我最能写的时候把我最想写的小说写出来。于是有了《四书》这本小说,写了很多知识分子,落脚点是这一段时期中国人的生存困境,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。这本

小说不管口碑好与坏,但有一点,在写作想象上达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,它的结构、语言、人物塑造都发挥了我最大才华、最大尝试。

小说出来后给了二十一二家出版社、杂志社,他们都打电话说,阎连科,你真的写出了好小说,但确实不适合发表出版。《收获》杂志的程永新对我说,我们没有发表你的小说,但你写出了我们杂志社遇到的最好的小说,小说不发表,但每个编辑必须看一看,这在杂志社是第一次。

从此以后,我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,包括后来的《炸裂志》、《日

熄》,都在不断遭到退稿,但我在写我最渴望写的小说,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自由的创作。这个时期是我退稿最多的时候,也是我写作最自由的时候。

退稿对作家不是坏事情。一个作家一生没遇到过退稿,那是非常悲剧的事情,会逐渐走向毁灭。一个作家有一部分退稿有一部分发表,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。一个作家像阎连科一样,一直被退稿,那也一定是坏事情。

写作是最大限度的想象自由,最大限度的生活真实认识,如果能达到这一点,即便退稿也不重要了。